

内部讨论
切勿外传、引用

中国妇女运动史
(1919—1949)

第四编

全国妇联
1988、5

第四编 土地革命中农村妇女的崛起
抗日民主运动中妇女界的重
新活跃

(1927.7—1937.7)

第一章 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的农村妇女
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各界妇女

(1927.7—1931.9)

第一节 为建立红色政权英勇奋斗的女战士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形势急剧低落。在反革命的联合绞杀下，大革命时期曾一度蓬勃发展的妇女运动迅速走向低潮，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被捕被杀，妇女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场严峻的考验摆在人们的面前。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此后，两百余次武装起义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锻炼和积蓄了人民革命力量，有的直接发展为苏维埃区域，成为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基地。

从国民党大屠杀的血泊中奋起的优秀妇女，直接参加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

一、南昌起义中的第一批女兵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参加起义的有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近3万人。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直接领导下，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南昌守敌，革命红旗飘扬在南昌城的上空。30名女兵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她们中间的大多数原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女生队学员，其中有指导员彭猗兰，学员彭援华、杨庆兰、胡毓秀、谭勤先等。有的来自宋庆龄举办的妇女党务训练班。在起义中她们主要担负宣传、救护、联络和组织工作。

南昌妇女解放协会的许多成员也参加了这次起义。7月下旬，妇协领导人周治中和周定中、陈才用等人准备好彩纸、红布、笔墨和浆糊，刷写了不少横幅和标语，内容有：“工农商学兵妇女团结起来，慰劳劳苦功高的革命士兵”，“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欢迎铁军东征”等等。8月1日，陈才用，王志莲等人率领三、四十名妇协成员分成5个宣传小队，赴各地宣传，每队5至7人，执一面小旗，她们在城内张贴标语，宣传起义的意义，动员商店开门，恢复正常营业，并发动革命群众和市郊农民劳军支前，把粮食、柴禾和蔬菜送到起义军的驻地，保证了起义军的后勤补给。起义军撤出后她们转入地下，坚持秘密斗争。

8月3日至5日，起义部队从南昌撤出，由赣东直取东江。30名女兵随军行动，除彭猗兰等3人留在参谋团外，其余27人分散在九军、十一军和二十军中。时值三伏，酷暑灼人，沿途部队给养十分困难。由于反动派的反共宣传，群众大都隐匿起来，因此，“食物与饮料全都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致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1)同时军队中没有卫生设备，医药缺乏，病者无法救治，加之起义军内部，缺乏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许多人对南下意义不了解，因而中途退却逃跑者甚多，仅行军数日，部队实力就减损了 $\frac{1}{3}$ 以上。然而，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30名女兵自始至终跟着队伍，沿途担任宣传和救护工作。年仅17岁的杨庆兰是女兵中年龄最小的，她臂力大，身体壮，枪法好，背的东西又

(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5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

多，与谭勋先等3位女兵一起被誉为“四大金刚”。会昌战斗打响后，她与许多身体强壮的女兵一起从火线上抢救伤员，其余同志被分配到临时医院，她们昼夜守护在伤病员面前，为他们端水换药，与他们拉家常，讲故事，减轻他们的痛苦。

在一个多月的征途中，女兵中不少人双脚起泡溃烂，有的中暑发高烧，但她们凭着顽强毅力克服困难，步行转战1000多里，经受了严酷战争的考验。

起义军在广东汤坑、揭阳一带遭到强大敌人的围攻，部分队伍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在东江一带受到群众的热忱欢迎。惠阳高潭的农妇在妇女会的组织下，每天往返60里山路，为起义军挑运布匹、粮食和机器零件。许多农妇主动腾出房子，日夜磨米、舂粉、酿酒，慰劳起义将士。

南昌起义的炮火诞生了人民军队，鲜明地树起武装斗争的旗帜。30名女战士是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随着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妇女在军事生活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广州起义中的英雄妇女

广州是大革命的策源地，这里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广州妇女在大革命时期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积极参加罢工，游行和示威活动，经历了革命战斗的洗礼，充分表现了她们的革命胆识和才能，积蓄了妇女革命力量。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参加广州起义的有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警卫团的部分士兵，还有广州工人赤卫队以及附近农军约2万余人。有许多妇女参加了起义。参加起义的妇女，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部分是广州的女共产党员和女共青团员。这些人经受过大

革命的锻炼，熟悉广州情况，如区梦觉、陈铁军、宋维静、高恬波等。起义期间，她们主要活动在女学生和女工群众之中，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少数则协助指挥部领导同志进行各项具体工作。

第二部分是广州各女工会的会员及省港大罢工的女工和家属。参加起义的有“广州织造工会联合会”、“广州土布工会联合会”、“广州洋务工会联合会”、“广州电筒工会”、“广州车衣工会”等工会中的女工，她们负责物资准备、交通联络、宣传群众和后勤供应工作。

第三部分是四军军医处和军官教导团中的女同志约30余人。她们中间的大部分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的学员，军校解散后参加了四军军医处和教导团于10月初南下到达广州，为起义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起义前夕，原“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陈铁军率领女工积极分子印刷传单、标语，书写口号和起义横幅，绣制带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土布工会委员李少珍想方设法购买红布，车衣女工赶着缝制红领巾、红袖章和红布条作为起义标志。女共青团员、制绣学校学生陈淑英和她的团小组为印刷大批宣传布告，一连忙了三个通宵。许多女工、女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偷运武器，她们装扮成不同身份，把子弹、手枪等武器放在菜篮里或礼品盒内，偷偷地运回广州。

1927年12月11日凌晨，静谧的广州城突然枪声大作，女生队学员与教导团的全体官兵摘下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系上红标志宣布参加起义，有的奔向临时救护所，有的持枪作战。女兵和女工们手拿枪支、梭标、剪刀、菜刀等跟着起义部队冲向反动派统治据点。在攻打市公安局的战斗中，许梅等6名女赤卫队员牺牲在公安局门前的阵地上。共青团员陈淑英和几名女赤卫队员参加了进攻惠福警察分局的战斗。

公安局攻占之后，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由陈铁军率领女工赶绣出来的红旗飘扬在广州城的上空。男女学生组成宣传队走街串巷张贴标语，高唱革命歌曲，许多“四·一五”后隐藏起来的妇女干部也出来加入他们的行列，高恬波率领女救护队员抢救伤员，3天3夜都没有合眼。由于起义队伍人数众多，战线分散，后勤供给十分困难，妇女组成“临时饮食队”，把饼干、面包和饭菜及时送到阵地，分发给起义将士。从市公安局到西湖路口，摆满了粥桶和茶水，妇女们的热情温暖着起义将士的心。

广州起义的消息震惊了全国。在蒋介石的指使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广东军阀仓皇组织力量进行反扑。女战士们把生死置之度外，与男同志一起浴血奋战。她们的枪筒烧红了，刺刀拼弯了，但誓与苏维埃共存亡的信念没有动摇。女生队队员邓苏、李蕴瑞等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2月13日，广州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反动军队在英、美、日帝国主义军舰和陆战队的掩护和配合下，登上了珠江北岸。这时，起义部队已经撤出，部分未接到撤退命令的男女战士们仍然坚守在阵地上。第四军教导团女兵班的战士们在班长游曦的带领下坚守在长堤街垒，与数十倍敌人反复拼杀，最后弹尽粮绝，全班除一名派回联络的战士外，都壮烈牺牲。敌人将游曦陈尸于天字码头“示众”，这个英雄的女兵班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我们一定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保卫苏维埃！”

起义失败后，反动派在城内进行大搜捕，只要翻出一块红布，一片红绸，不问清红皂白，抓了就杀，就连穿红衣服的新娘子也不能幸免。许多妇女被扒光衣服，肆意侮辱，然后惨无人道地杀害。反动派的凶残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几日之内，广州街头尸体枕藉，血

流成渠，沸腾的广州变成死寂的城市。

然而，敌人的恐怖和屠杀政策，吓不倒革命的妇女，她们以各种方式继续战斗。教导团的队伍1200多人转移到花县，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开往海陆丰，和彭湃的队伍汇合，创建了海陆丰根据地。教导团和军医处的张瑞华、危拱之、郑梅仙和钱瑛、廖德璋、王月华等跟着这支队伍转战各地，坚持斗争。

起义队伍撤出广州后，陈铁军留在党的秘密机关，掩藏、烧毁和转移了有关文件物品后转移到香港。不久党又派她回到广州，与同文雍扮成假夫妻，重新建立党的秘密机关，1928年初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高官厚禄的引诱，动摇不了他们的革命意志，最后在红花岗英勇就义。高恬波被派往江西省委住机关，她机智灵活，坚持斗争，引起敌人的恐慌和注意。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省委机关被破坏，高恬波被捕，虽然严刑拷打，仍英勇不屈。1929年被害。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以湘、鄂、赣、粤为中心的秋收起义。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走上了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其中有不少女学生、女干部，深入农村宣传发动妇女群众，组织武装暴动，有的担任指挥员率兵打仗，在农村武装斗争中初试锋芒。这些地区的妇女在北伐战争时期曾经组织起来开展反对封建礼教、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因此这里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运动蓬勃发展的起点。

1927年8月21日，针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妇女运动的低落状况，中共中央常委通过了《最近妇女运动决议案》，要求所有党委积极恢复妇女部，吸收女工农妇参加斗争，并“训练她们的秘密工作的知识，指导她们的斗争，一直到参加暴动中的各种工作。”

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各级党组织选派了一批优秀的女知识分子“作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广东共青团团委书记夏民在彭湃支持下到海陆丰紫金一带发动农村女青年。她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学会了当地方言，深入农村群众，被人称为“区为民”。1928年牺牲时年仅22岁。14岁的女学生谢飞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广东文昌县，担任区妇女会主任，兴办平民小学。领导妇女开展反土豪反封建婚姻的斗争，同年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各地男女知识分子的普遍发动，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沉寂的妇女运动重新活跃。许多地方恢复了妇女组织，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反对封建婚姻的斗争，农妇纷纷行动起来，掩护革命同志，准备武器弹药，筹集起义经费，制作起义标志，筹备粮草，为武装暴动作了大量的工作。

1927年底，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进入湖南南部，在宜章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曾志、吴仲廉、彭儒等一批女知识分子和妇女群众参加了这次起义，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暴动前后妇女写标语、筹粮、夹道欢迎起义将士，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妇女又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各地农民武装暴动中，妇女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起义枪声打响后，妇女从家里找出梭标、长矛、鸟铳等武器和起义队伍一起冲向反动派统治根点。1927年11月的湖北黄麻起义中，黄安麻城的许多妇女慷慨拿出自己陪嫁用的红衣服、红被面，夜以继日地缝制红旗和赤化带。10余万妇女组成后勤队伍，送饭、送水、搞运输，抬担架，来回穿梭。在攻打黄安麻城的斗争中，妇女们手拿菜刀、剪刀、竹杆等武器，配合农民自卫军作战，显示了妇女的声威。当时流传的一首民

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正是农村妇女踊跃参战的真实写照。

1928年3月福建龙岩发生了震撼闽西的后田暴动。女农会会员张龙地带领着由200多名妇女组成的暴动队，拿着大刀、锄头、铁耙等进攻龙岩城。她们按照指挥部指示登上城南的莲花山，高喊：“冲啊”、“杀啊”为暴动队伍助威。在万安暴动中也有不少妇女参加。暴动前妇女做草鞋、粘标语，做土炮。从1927年11月20日到12月31日，万安农军三次攻城未克，妇女不仅支持丈夫、儿子参加暴动，而且担任煮饭、侦察、运输、护理伤病员等工作，还组织起妇女宣传队、妇女赤卫队，在交通要道站岗放哨，维持社会治安。1928年1月，万安农军第四次攻打县城，4万多名农军中有9千名妇女。他们分三路纵队进逼县城，把敌军打得落花流水，成立了江西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

1929年11月，张云逸、邓小平在广西左右江地区举行了百色农民暴动，成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建立起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包括20多个县100多万人，其中壮族占人口总数90%左右，瑶族占人口总数6%左右，汉、苗、彝族占2%。大革命时期，壮族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曾在东兰创办了广西第一个妇女运动讲习所，培训了50多名妇女骨干。随着农村运动的兴起，妇女也发动起来了。大革命失败后，左右江妇女组织遭到破坏，但仍有少数妇女骨干与农民自卫军一起坚持斗争。

由于左右江的妇女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女学生也很活跃。在百色起义筹备期间，邓小平与张云逸时常抽空到百色五中作周会演讲，培训妇女骨干，有一批女学生直接参加到红七军政治部和经理处工作。

百色起义成功后，右江地区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

镇隆重召开，80名工农兵代表中，有女代表15名。

在风起云涌的各路农民武装暴动中，妇女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其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指挥员，她们为红色政权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勋。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学员胡筠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湖南平江虹桥，任北乡暴动委员会主任。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她当众烧毁了地契，打开公家粮仓，亲自掌斗把粮食分发给穷苦农民。在实际斗争中她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变卖家产买了许多枪支，拉起一支50多人的游击队。她们活跃在幕阜山下，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在攻打平江的战斗中，胡筠担任平江工农暴动委员会委员，亲自指挥游击队和农军攻打平江北门，直捣敌司令部，后由于敌人增兵而撤出。此后，胡筠毅然担负起平江县委负责人重任，率领游击队，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屡获胜利。“胡筠部队”不断扩大，声闻遐迩。当地群众尊称胡筠为“平江女将”。

1928年2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到达莱阳县城。莱阳县苏维埃负责妇女部宣传工作的伍若兰和地下党的同志一起组织农军攻打反动地方武装，有力地配合了工农革命军的行动。不久敌人调动大批军队对湘南进行“会剿”，伍若兰等人担负着阻击敌人的任务，她率领莱阳农军用梭标、大刀、土枪等武器英勇地抗击敌人。他们苦战15日，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农民暴动组织者之一。她原是福音女中学生。能文能武，英勇善战。在暴动中，她曾是中共吉安县委妇女部长，率领了一支农民梭标队守卫永新。

在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的途中，几十名妇女随军行动。曾志、伍若兰、吴仲廉、彭儒、段子英等人边行军边作宣传工作，她们沿途

提着石灰桶，刷写标语口号，向敌军喊话，最后随军到达井冈山，参加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她们和贺子珍、贺怡，康克清一起，成为最早上井冈山的一批女红军。

此外，毛泽建、汪起凤、李贞等都是在各地农民武装暴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妇女骨干，还有湘西第一名女红军蹇先任，湖北九岭岗农民起义的领导人黄杰，陕北游击队第一名女指导员任志贞等，都是当地妇女运动中的佼佼者。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开端，同时也是妇女参加武装斗争的起点，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一场以农村为主体的妇女运动将在中国广大农村蓬勃兴起，成为苏维埃运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第二节 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各界妇女

一、女工的悲惨境遇及斗争

国民党在全国确立了它的统治后，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建立起一党专政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制度。在对人民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凭借其政治军事权利，以超经济的手段，巧取豪夺，迅速聚敛了巨额财富，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种官僚资本的出现及其迅速发展，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又增多了一个对手。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区，整个国民经济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的倾轧，民族工业却呈现出逐步萎缩，危机加深的趋势。

在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广大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尤为深重。工会被封闭了，协调劳资双方利益的集体契约被取消了，无数工人被无辜杀害，成批的熟练工人被开除，在大革命时期争

取到的有限的权利陆续都被取消了。如武汉工人1928年—1929年的工资，80%的都比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减少，加上物价上涨，失业的威胁，劳动条件的恶化，工人阶级生活日益窘迫。

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除了减少工资，延长工时外，还采用以不熟练的女工童工代替熟练男工的办法。因此这一时期女工童工的数目都比前一个时期有大幅度增加。据1930年工商部发布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山东、广东、广西、福建九省28市的统计，女工达374,117人，在全部工人中占46.4%，童工达55,605人，占全部工人的7.2%，她们分布在下列行业：

工业部门	纺织	饮食	服装	化学	杂品	建材	水电
女工人数	337546	14843	3373	9907	1343	108	81
童工人数	41794	1407		3335	3,657	719	15
	其他						
女工人数	10289						
童工人数	5,578						

其中，在纺织业中女工人数是男工人数的2.85倍。

再看看上海、天津、汉口女工人数的情况。

1929年上海纺织业男工、女工、童工统计表

	男工	女工	童工	总计
棉纺业	29,000	62,600	3,000	94,600
织布业	4,400	4,500	500	9,400
总计	33,400	67,100	3,500	104,000
百分比%	32.1	64.5	3.4	100
				(1)

(1) 顾平波《上海纱厂女工》《妇女杂志》16卷5期 1930.5

1930年汉口各业工人性别比较表

	纺织业	火柴业	丝麻业	织袜业	烟草业	毛巾业
男工	407	357	28	200	48	26
女工	1,231	1,083	432	79	132	75
童工	313	68	303	87	—	56
	皂烛业	其他	总计	百分比%		
男工	108	1170	5204	53·6		
女工	10	230	3338	34·3		
童工	7	192	1180	12·1 (1)		

天津女工人数1930年时共4,508人，她们最多的是在纱厂做工，纱厂女工2153人，全部集中在裕元、裕大、北洋、宝成、华新五大纱厂，其中又以裕元为最多，有983人，在五厂女工中占了45·64%。(2)

资本家大批雇佣女工，目的在于榨取高额利润，因此女工的生活待遇、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低，各种厂规之严酷，在世界劳工界都是罕见的。据英文导报1928年4月22日报导，上海织布女工每日工作13小时，缫丝女工每日工作12小时，纱厂女工每日工作12小时，卷烟女工工时为10小时，印刷女工工时为9小时。天津32家工厂女工工作时间大部分在10—12小时之间，有的甚至达到13—15小时(3)。汉口织袜女工每日工作时间为14小时，广州、无锡女工每天绝大部分要工作11小时以上。工

(1) 《妇女杂志》16号8分 1930. 8

(2) 郭箴—《中国妇女问题》 177页。

(3) 公度《中国女工问题》 《妇女杂志》15卷9号 1929. 9

作 8 9 小时的绝无仅有。据女青年会调查部报导，1934年无锡庆丰纱厂布机车间改变过去早六时进厂，晚六时出厂的规定，变为早四时进厂，晚八时出厂，每日工作长达 16.5 小时(1)。至于有些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女工为生活所迫，每日工作时间更无保障了。女工们每日超强度的劳作，却没有休息的保证。据女青年会 1927 年对天津 5864 个女工进行的调查， $\frac{2}{5}$ 的女工不能保证每周有一日休息。其中大部分是两月休息一天，还有 150 人没有固定休息日。

女工每日辛勤工作，所得报酬却大大低于她所创造的价值，甚至比男工也低许多。尽管国民党政府 1932 年颁布了的《修正工厂法》里面冠冕堂皇地规定“男女作同等之工作而其效力相等者，应给同等之工资”，但同一年《劳动年鉴》发布的男女工资表却无可辩驳地说明男女同工不同酬是中国劳动制度中一个普遍现象。

1932 年男女工资比较表（月薪）

地区	男工月薪	女工月薪	女工为男工百分比
上海	0·67 元	0·5 元	74%
天津	0·45 元	0·2 元	44%
汉口	0·39 元	0·25 元	65%
地区	男工工资	女工工资	女工为男工百分比
无锡	0·667 元	0·57 元	85%
广州	0·354 元	0·25 元	70%
平均			67·7% (2)

(1) 《人报》 1934 年 6 月 26 日。

(2) 郭箴—《中国妇女问题》 186 页。

1929年广州男女工资表 (月薪)

行业	男工工资	女工工资	行业	男工工资	女工工资
火柴	10·5元	6元	漂染	16元	9元
医药	10·6元	7·5元	毛刷	25元	12元
香烟	35元	12元	制帽	7元	10元
平均	17·33元	9·25元		女工工资为男工工资的53·4%	(1)

以上两表可以看到，女工工资普遍比男工工资低，最多的低近 $2/3$ 。

上海各行业女工工资的具体情况 (单位 角/日)

行业	最高工资	最低工资	平均工资	行业	最高工资	最低工资	平均工资
化装	8	3·5	5·75	印染	4·5	2·5	3·5
卷烟	8	3	5·5	服装	5	2	3·5
纱厂	5	1·5	3·25	橡胶	4·5	3	3·75
缫丝厂	5	4	4·5	化工	7	3	5
绸厂	9	2	5·5	洗染	4	2	3
织布	4·5	2·5	3·5	绒布	5	2	3·5
针织	5·5	2	3·75	平均	5·77	2·46	4·2

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出现衰败的情况，资本家为了转嫁危机，拼命压低工人工资，女工生活更加窘迫。下面是1934年《中国经济年报》公布的1930年至1934年缫丝女工工资变化(日薪、单位为元)

(1) 郭箴—《中国妇女问题》180页。

(2) 郭箴—《中国妇女问题》172页。

年 代	丝 间 工 人	缫 间 工 人	打 筛 工 人	抄 茧 工 人	扯 吐 工 人
1930	0·65	0·6	0·38	0·6	0·38
1931	0·6	0·55	0·35	0·55	0·35
1932	0·5	0·45	0·28	0·45	0·28
1933	0·5	0·45	0·26	0·46	0·26
1934	0·42	0·38	0·22	0·38	0·22
五年降 差	-0·23	-0·22	-0·16	-0·22	-0·16 (1)

从上表看，五年中女工工资少则降低了 $1/3$ ，多则将近低了一半。当然，资本家延长工时后，工资不变，实际上也就降低了工资。如前边例举的无锡庆丰纱厂，工时延长了 4·5 小时，而工资仍维持在 0·5 元左右，资本家实际上无偿占有了工人 4·5 小时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天津裕元纱厂生产 20 支纱，每包原需支付 20 元左右，到 1935 年则降到 9 元左右了。从这里可以看出，1934 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从衰败萧条中恢复过来，并有了一定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济衰退中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

女工们生产的条件历来十分恶劣。在丝厂缫丝车间，女工们用一个小茅草刷，把蚕茧在锅中来回晃动，使它软化。“大部分童工都是这么小的女孩，有些简直还是女婴，小脸被长期的热雾熏得发白，细弱的躯体，甚至在冬天经常为汗水浸湿……中国的女监工也经常往返查巡，对效率低或者假设是偷懒的童工，不时把她的小手放在沸腾的

(1) 罗琼《恐慌深化期中的中国行业妇女》《妇女生活》1卷2期 1935年8月

锅里加以惩罚⁽¹⁾，“工厂厂房低矮阴暗，毫无任何通风设备……到处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气味。可以看到随随便便往旁边搁的吃奶婴儿，到处可以遇到面色苍白、骨瘦如柴、艰难地在进行操作的小女孩”。
“机器旁、车床边挂着一只只蓝筐，筐里装着女工们吃奶的婴儿。这些婴儿放在家里无人带，上班时间无处送，当妈妈的女工只得带来工厂，用蓝筐装上搁在车床旁”。⁽²⁾在纱厂，压缩包装间数百名女工和童工“蹲在石板地上，絮尘满天飞，她（他）们吸着这污浊的空气，一天要劳动十二小时”。在分类车间“童工们蜷缩着身体蚊虫般在地上蠕动，拣选棉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厂房里，花絮飞扬，尘埃扑面，东西都看不清楚，工人们一天要在此劳动十二小时。她们连吃饭时间都没有，可是一天只得到二十个铜板”。“这个厂工人的样子看起来叫人可怕。厂里到处都可以听到止不住的咳嗽声。工人们一个个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疲倦不堪的脸上布满灰白色的尘埃，透过灰尘可以明显地看到因发烧、打疟疾而出现的红晕，死神随时都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³⁾在青岛纱厂“十三四岁小孩，做夜工得站着做十三四点钟，稍一合眼，在冬季里，日本人就拿水笼管子，披头浇下，将衣服与皮肉冻成一块，还不许停工，不准哭泣，并且还打还骂，还罚钱；在夏季里，将小孩子以麻绳绑起，悬于钱筒上，三十分钟方放下，再打一顿，罚两天工钱”。对女工“最可恨的，就是搜查女工，将鞋脱下，再将脚带解下搜查。有的还得脱得净光搜查。有新来的日本人，没看见中国缠足样子，特为叫中国女工，将裹脚带解下，给他们日本

(1) 汪敬虞《中国的大门》，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1卷。

(2)(苏)A·洛佐夫斯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927年9月。

出处同(1)。

(3)(苏)A·洛佐夫斯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927.9 出处同前。